

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研究之网络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

——基于123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实证

李元旭¹, 黄平¹, 王宇露²

(1.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200433; 2. 上海电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 上海 200245)

摘要:网络学习能力是网络能力的一个重要维度。网络学习能力影响了海外子公司的特定优势,进而影响了跨国公司整体的国际竞争力。通过解析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结构,本文分析了网络学习能力在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节效应,实证表明: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了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了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网络学习能力负向调节了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

关键词:海外子公司;网络结构;位置嵌入;网络学习能力;网络学习效果

中图分类号:F27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10)08-0104-06

战略研究中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不同的企业在行为与获利能力上存在差异。为了回答这一问题,研究者通常将企业看作是一个自治的组织(autonomous organization),从外生的产业结构视角或是内生的企业资源与能力的视角来研究。但是,随着社会网络化范围的扩大以及程度的加深,特别是企业间网络的形成与发展,这种将企业看作是在非人格化的市场中为获得利润进行原子状竞争(atomistic competition)的视角,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1]。网络已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一种源泉。在国际经营背景下,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成员一起进行网络学习,获取东道国经营经验,学习东道国网络中的供应商、经销商、高校科研机构等组织的先进技术、管理知识,不仅获取了子公司特定优势,而且大大提升了跨国公司整体的国际竞争力。因此,网络学习已成为企业利用网络获取竞争优势的一种战略行为。然而,对中国企业国际化现状的考察发现,处于类似网络结构的海外子公司表现出的学习效果却有着非常大的差异,海尔、华为等少数公司通过在海外市场的网络学习实现了国际竞争力的提升,而TCL等大部分中国企业却从国际市场败退。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认为,海外子公司的网

络学习能力差异可能是导致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在“走出去”已经成为广大中国企业发展战略中关键一环的今天,研究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与中国企业国际经营成败关系无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在梳理社会嵌入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三维结构构成理论。通过发展网络能力理论,分析了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在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节效应,并收集123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以期为中国企业提高网络学习效果,建立海外子公司的特定优势,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提供理论借鉴。

1 文献综述

随着人们把视野拓宽到与公司价值链和生产过程相关的网络,Kekule和Viitala^[2]提出的网络学习逐渐成为组织学习理论和战略管理领域的新兴研究热点。在海外子公司经营的东道国网络中存在多种网络知识,如网络的结构,网络成员的信息(包括网络成员的特质、网络关系、网络位置、网络机会等)、网络成员的诀窍和技能(包括利用、占据网络位置的方法、塑造网络结构的方法等)。通过与网络成

收稿日期:2010-04-1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企业承接跨国公司服务外包研究”(70972042);上海市教委创新基金项目“基于三网络嵌入互动的实践社区默会知识共享机理研究”(10YS220);上海电机学院科研启动经费项目“中国企业国际化的合法性生成机制与效应研究”(10C402)。

作者简介:李元旭(1966—),男,湖北当阳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研究方向: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黄平(1975—),男,浙江丽水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跨国公司;王宇露(1978—),男,湖南岳阳人,上海电机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知识管理与跨国公司。

员间建立密切的关系,占据特定网络位置,构造网络结构等战略行为,海外子公司不仅能获取和利用这些网络知识,而且能为网络创造知识,我们认为,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即是海外子公司在网络环境下与其他网络成员进行知识的创造、吸收和利用的经济社会过程。与联盟、集群等网络组织的学习相比,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在学习环境、学习治理、学习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之处^[3]。

Larson^[4]、Uzzi^[5]、Granovetter^[6]、Burt^[7]等学者的大量研究表明,网络结构对网络学习效果有着显著影响。但是,在社会学学者中,关于网络结构与学习效果的关系仍存在争议,由此形成以 Uzzi 等人提出的“网络嵌入悖论(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网络嵌入悖论可分为关系嵌入悖论和结构嵌入悖论两种。关系嵌入悖论指的是:强关系和弱关系都被认为有助于知识获取。强关系观认为,行动者之间的社会关系越紧密,越有利于企业获取高质量的信息和进行默会知识的转移。如 Uzzi^[8]对美国纽约企业的调查发现,在同行业中,具有强关系的企业间更能够彼此交流知识。而弱关系观认为,弱关系在社会网络中没有联结的成员间传递独特的非剩余信息,从而保证了行动者获得异质性信息的可能性。结构嵌入悖论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Zaheer 和 Bell^[9]等学者认为,高密度网络能有效地防范机会主义行为,促进知识的沟通和共享,另一方面,Uzzi 等学者认为,在高密度网络中信息同质的可能性更大,行动者增加的关系很多是过剩的,在低密度网络中,网络外部的新颖信息向网络中的渗入更为容易,并且,企业间紧密的伙伴关系会不利于企业间的突变性或者多元化的知识分享。我们认为,存在网络嵌入悖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前人研究忽视了网络学习能力在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调节效应。

2 网络学习能力调节作用

社会嵌入理论是解构社会网络结构的重要理论。从对嵌入的系统描述维度或嵌入的操作维度,可把各种嵌入分为关系嵌入、位置嵌入和结构嵌入。关系嵌入是研究二元关系的结构特征,位置嵌入是分析个体所处的网络位置对其行为的影响,而结构嵌入是分析网络的整体构造对其行为的影响。

在国际化过程中,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中的供应商、顾客、分销商、科研机构等主体产生业务、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相互依赖,形成了关系嵌入。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们可通过关系嵌入强度来反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关系嵌入。由于东

道国网络成员在内部知识、业务和能力等资源方面的禀赋存在不同,从而出现了网络资源在网络内分布的不平衡。东道国网络成员拥有的资源差异也导致海外子公司与其嵌入关系的强度和内容也出现差异。一般来说,海外子公司与资源丰富、能力强的网络成员的关系更为密切。此外,海外子公司会与资源和能力不同的网络成员建立不同的关系。比如说,海外子公司会与研发能力较强的组织,更多地就技术方面进行往来。

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在东道国网络中都有特定的位置。这些位置刻画了网络成员间的关系。我们可通过位置嵌入来刻画网络成员在整体网络中的位置对于其形成网络决策的影响。Johanson 和 Mattsson^[10]认为,从演化视角来看,网络位置是网络中海外子公司和其他网络成员前期活动的结果,并成为促进和限制海外子公司发展的基础。在东道国网络中,占据中心位置的企业会运用其占有的地位和关于其他企业能力的详细信息以及信息仲裁的可靠性来获取利益,或者通过更集中于中心位置的信号属性来获取利益。由于网络中心位置能为网络成员带来战略优势,因此其他网络成员会争相追逐中心位置,或与中心位置占据者建立关系,从而导致对中心位置的追逐逐渐激烈。另一方面,中心位置的战略稀缺性会使得中心位置占据者逐渐提高对中心位置的利用程度。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位置是先赋位置和自致位置的综合。先赋位置是跨国公司总部或母公司赋予其特定的使命和经营目标而带来的位置,在海外子公司成立之初,这一位置就确定下来的。当然,后期也可能会有变化。而自致位置是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生产经营中获得与占据的网络位置。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思想,我们可通过网络中心度来反映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位置嵌入。

在国际化过程中,海外子公司、科研机构、客户、政府、供应商、行业协会等主体间会根据相互依赖的程度决定各自在合作中的角色地位,从网络整体视角看则表现为网络位置的总体分布和总体关系的紧密度。借鉴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我们可从网络密度、群体中心度等方面分析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结构嵌入。

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为海外子公司的成长提供了获得知识等网络资源的潜力。但海外子公司的网络获益是由网络资源,企业利用这些资源的能力,以及企业间关系模式等要素构成的函数。没有形成网络能力的企业将面临成长的壁垒,东道国网络也将更多地表现出限制性。因此,虽然特定的网

络结构赋予了海外子公司获取知识的潜在可能,但其是否能如愿实现知识的获取还取决于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许多学者曾指出,能力(Capability)是知识、业务过程和组织学习的整合,能力包括基础(Infrastructure)、学习和行为3个维度。因此,网络学习能力是网络能力的一个重要二级变量。网络学习能力包括以下维度:学习承诺(commitment to learning)、共同远景(shared vision)和开放性(open-mindedness)。学习承诺(commitment to learning)主要是指企业强调学习作为谋求企业长期竞争优势的重要程度,对学习的承诺有助于企业形成一个学习的氛围。一个强调学习的组织通常将学习作为维持企业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投资。一个企业的价值观念越强调学习,其学习活动就越有可能发生。共同远景(shared vision)主要是指企业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强调对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认识的一致性程度。Verona^[11]强调,如果没有共同远景,即使组织成员有足够动力去学习,也很难知道应该学习什么。在企业网络活动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很多创新性的想法由于缺乏共识而难以实施。很多重要的想法很难转化为行动,主要是因为组织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利益。Brown 和 Eisenhardt^[12]注意到,企业内不同部门间在获取和解释知识的方式也存在着不同。例如,营销部门更关注于市场行情,而研发部门更倾向于技术与产品创新方面。这导致了对知识或信息的不同解释,即使是对同一信息也会存在不同的认识。共享远景有助于协调各部门的关注焦点,从而增强学习的质量。开放性(open-mindedness)主要是指企业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动中,工作部门内部、跨部门团队在网络关系管理活动和关系任务执行决策中所发挥合作及协同作用的程度。组织开放性有助于企业评估组织中网络关系任务执行的惯例,从而接受新的观点和思想。开放性主要体现在团队协作精神、团队工作方式以及与合作伙伴合作共事过程中的目标定位和具体策略等方面。团队协作精神和团队工作方式可以有效发挥企业内部的协同作用,有利于企业在与网络成员的互动过程中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变革和市场环境。

Tsai^[13]明确提出,尽管一个中心网络位置提供了获得新知识的重要途径,它对业务单元创新和绩效的影响可能依赖于这一单元吸收这些新知识的程度。一个单元可能可以获得一些新知识,但如果它

没有足够的能力吸收这些知识,它就不能提高其创新和绩效。一个单元越能接近其他单元的知识,它就越需要吸收能力以从这些知识中获益。占据中心网络位置的组织单元能接近来自其他单元的新知识。由于网络学习是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的过程,而不仅仅是一个知识转移的过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在同样的东道国网络结构条件下,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学习效果会越好。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2: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3: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假设4: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正向调节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

3 实证研究

3.1 数据与样本

数据收集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向在华跨国公司子公司中高层管理者发放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268份,收到来自浙江、上海、江西、北京、广东等地的有效问卷123份,有效问卷率45.9%。在有效问卷中,总部所在地为美国和欧洲的海外子公司有80家,占样本总数的65%,其他主要来自于日本、韩国、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这与在华投资的500强跨国公司来源情况较吻合。样本涵盖的行业范围较广,包括传统制造、信息、金融、零售、贸易批发和化工等行业。样本海外子公司的规模分布也较合理,年销售收入在5亿人民币以上的有71家(占57.7%),5000万~5亿的有37家(占30.1%),5000万以下的有15家(占12.2%)。

3.2 变量测量
对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结构,本文借鉴Granovetter^[6]、蔡宁^[14]等人的研究成果,通过关系发生的频率来测量关系嵌入的强度,对海外子公司与东道国网络成员间的关系频率分为“几乎没有往来”、“每年一到两次”、“每半年一到两次”、“每季度一到二次”、“每月一到两次”5档,分别赋予1到5。嵌入关系具体分为技术关系、管理关系和业务关系3种。网络中心度、群体中心度和网络密度的度量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中的相应度量方法^①,运用

① 刘军. 社会网络分析导论[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4.

近似提名诠释法^①获取数据,然后输入 Ucinet 6.166 软件计算,得到 3 个指标的最终数值。

对于网络学习能力,本文借鉴 Sinkula 等^[15]对组织学习能力的度量,考虑在华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的特殊性,我们从学习的承诺、共享的远景和开放性 3 个维度,通过 11 道问题,采用 5 点李克特量表来测量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

在网络学习效果的度量上,我们借鉴 Tsang、Nguyen 和 Erramilli^[16]等在组织间学习、知识转移和网络学习领域的研究成果,从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的目的出发来构建量表。我们认为,海外子公司进行网络学习的目的包括以下 3 方面:探索并获取新的知识;学习和获取网络成员以及与网络有关的知识;提高对现有知识的认识和利用程度。因此,网络学习的效果应反映以上 3 方面的成效,我们把其归纳为两点:一是知识获取的多少,包括从东道国网络成员处学得的知识以及共同创造获得的知识;二是知识的利用效果,包括学习所得知识对现有知识的提升,如是否改进了产品质量,是否提高了生产效率等。因此,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网络学习效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的获取,二是知识的利用。问卷从市场知识、技术知识和管理知识的获取、知识利用效果两方面来衡量网络学习效果。

3.3 信度和效度分析

采用 SPSS13.0 对回收样本作 Cronbach α 测试发现,总量表和网络学习能力、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

的 α 信度值分别为 0.852、0.870 和 0.757,均在 0.7 以上,反映本研究量表的信度较理想。对网络学习能力分量表的效度分析发现,KMO 值为 0.885,大于 0.5,Bartlett 半球体检验小于 0.001,支持因素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和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进行因素抽取,得到三因素结构,三个因素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67.14%,说明该分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对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的效度分析发现,KMO 值为 0.803,大于 0.5,Bartlett 半球体检验小于 0.001,支持因素分析。按照特征根大于 1 的原则和最大方差法正交旋转进行因素抽取,得到两因素结构,两个因素共解释了总方差的 55.95%,说明该分量表的结构效度较好^②。

3.4 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学习能力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 Amos 5.0 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模型的主要拟合度指标如表 1 所示。模型 M1 为不添加任何可观察变量相关的原始模型,修正模型 M2 的各项指标得到明显改善。M2 的 $\chi^2/df=1.179$ 、 $P=0.14$,未达到显著水准,表示本研究假设模型的共变量矩阵与实证资料的共变量矩阵之间无差异存在。GFI 值为 0.94,大于 0.90 的可接受值。RMSEA=0.038,显示本假设模型良好。NFI=0.93、CFI=0.99,大于 0.90 的可接受值。PNFI=0.64、PGFI=0.54,都大于 0.5,因此模型的简效拟合度指标可以接受。

表 1 网络学习能力验证性因子分析的拟合度检验

模型	χ^2/df	P	RMSEA	GFI	PNFI	PGFI	NFI	CFI
修正前 M1	2.583	0.000	0.114	0.84	0.66	0.56	0.82	0.88
修正后 M2	1.179	0.208	0.038	0.94	0.64	0.54	0.93	0.99

3.5 海外子公司东道国网络学习效果的验证性因子分析

运用 Amos 5.0 对海外子公司的东道国网络学习效果进行一阶验证性因子分析,主要拟合度指标如表 2 所示。模型 M1 为不添加任何可观察变量相关的原始模型,M2 为建立误差关联后的修正模型。M2 中, $\chi^2/df=0.870$ 、 $P=0.577$,表示本研究假设模型的共变量矩阵与实证资料的共变量矩阵之间无差异存在。GFI=0.97>0.9;RMSEA=0.000;

NFI=0.95>0.90,CFI=1.00>0.90;PNFI=0.54,PGFI=0.42,PNFI 大于 0.5,PGFI 小于 0.5。PNFI 完全符合标准,而 PGFI 虽然低于标准的临界水平,但与临界水平较接近,因此,总体上来说,模型的简效拟合度指标还是可以接受的,它反映了模型比较简约。对比修正前后的指标发现,模型 M2 的拟合度除了 PNFI 和 PGFI 两个指标拟合度有所退化外,其余各指标均较有所提高,且各项指标拟合良好。因此,接受模型 M2。

① 提名诠释法和提名生成法是社会网络分析方法进行问卷设计的两种重要方法。提名诠释法针对提名生成法中列出的关系人进一步询问他们与受访者间的关系。为了方便问卷填制者和保护样本海外子公司的商业秘密,本文以供应商、客户、竞争者、合作者和高校与科研机构等通称指代了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网络的相应成员,所以对东道国网络成员的产生与提名生成法并不完全一样。

② 囿于篇幅,正交旋转后的网络学习能力分量表和网络学习效果分量表的因素载荷矩阵未列出。

表 2 网络学习效果的拟合指标

模型	χ^2/df	P	RMSEA	GFI	PNFI	PGFI	NFI	CFI
修正前 M1	1.400	0.143	0.057	0.95	0.60	0.47	0.90	0.97
修正后 M2	0.870	0.577	0.000	0.97	0.54	0.42	0.95	1.00

3.6 网络学习能力在东道国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间调节作用的验证

运用 SPSS13.0 统计软件进行层次回归分析,检验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东道国网络结构与网络学习效果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统计结果如表 3 所示。对网络学习能力与关系嵌入强度、网络中心度、群体中心度和网络密度交互作用的回归分析发现,在网络结构各变量中,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负向调节,回归系数为-2.176($P<0.05$)。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 1.934($P<0.05$)。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 0.367($P<0.05$)。此外,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产生调节作用。

表 3 网络学习能力的调节作用

效应		网络学习效果	
		模型 I	模型 II
主效应	关系嵌入强度	0.123*	2.010*
	网络中心度	0.172*	1.448**
	群体中心度	-0.165 t	-0.260
	网络密度	0.274*	-1.108*
	网络学习能力	0.197*	0.885 t
交互效应	关系嵌入强度*网络学习能力		0.367*
	网络中心度*网络学习能力		-2.176*
	群体中心度*网络学习能力		0.15
	网络密度*网络学习能力		1.934*
ΔR^2			0.045
R^2			0.502
Adj R^2			0.462
F		19.693***	12.655***

注:“***”代表 $p<0.001$;“**”代表 $p<0.01$;“*”代表 $p<0.05$;t 代表 $p<0.1$ 。

4 结论与建议

4.1 研究结果讨论

本文以 123 家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为样本,运用 Ucinet6.166 和 SPSS13.0 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在网络结构各变量中,网络密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 1.934($P<0.05$)。这说明,在网络密度

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网络学习效果越好。关系嵌入强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正向调节,回归系数为 0.367($P<0.05$)。这说明,在关系嵌入强度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网络学习效果越好。

实证研究发现,网络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受到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能力的负向调节,回归系数为-2.176($P<0.05$)。这表明,在网络中心度一定的情况下,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网络学习效果反而越差。这似乎难以理解,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由于网络学习是网络成员间的一种知识创造、知识获取和知识利用的活动。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与东道国网络成员的网络学习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学习竞赛”的关系。因此,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效果不仅仅取决于海外子公司自身的意愿和能力,而且取决于东道国网络成员的意愿和能力。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东道国网络成员深知自己在‘学习竞赛’难以胜出。因此,它们将缺乏动力积极参与网络学习,甚至它们还会采取更为严厉的防范举措防止知识的溢出,并加强知识的保护。这就会出现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越强,网络学习效果反而越差的现象。

此外,实证研究还发现,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产生调节作用。对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可从以下方面解释:1)在群体中心度一定的情况下,网络成员的学习意愿决定了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效果。比如说:在群体中心度较高的情况下,其他网络成员间的知识交流和共享很少,此时,即使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较强,但大的学习环境决定了其网络学习效果仍然难以得到较大的提高。所以由此可以认为,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的改善首先需要改善网络的整体结构。2)网络的异质性较强,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差异较大,即使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很强,但缺乏学习的机会,从而导致海外子公司的网络学习能力对群体中心度与网络学习效果间的关系未产生调节作用。

4.2 管理启示

首先,研究使我们认识到网络学习能力对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的重要影响,为中国企业海外子公司进行网络学习能力建设指明了方向:一是中

国企业海外子公司应建立激励和回报制度,激发员工的学习积极性。二是应建立培训和发展制度,对员工进行有针对性的、持续的培训和发展,使其掌握网络学习技能。三是通过塑造团队学习的良好文化氛围,促进经验的共享和交换。其次,海外子公司在选择东道国网络成员时,一方面应保证网络成员间的知识具有一定异质性,这有助于防止网络成员间的过度“学习竞赛”,另一方面还应确保网络成员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共同的知识基,这保证了各方都有机会从网络学习中获益,有助于提高各网络成员参与网络学习的积极性。

4.3 研究限制与未来研究建议

在抽样方法与样本数量,本研究存在一些限制。以跨国公司为对象的研究往往难以获得调查样本,本研究利用便利抽样方法,收集了123个样本,但没有考虑样本所在产业的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的稳健性。其次,在研究关系嵌入时,囿于数据收集的难度,考虑到研究的可行性,我们对模型进行了简化,没有逐一分析嵌入关系的内容,而是把业务嵌入、技术嵌入、管理嵌入等多种嵌入关系整合成关系嵌入这样一个综合变量。因此,这对于各种嵌入与网络学习效果的关系分析只是初步的,未来有待深入挖掘各种嵌入对于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效果的影响。

参考文献

- [1] GULATI J. Network location and learning: the influence of network resources and firm capabilities an alliance formation[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9, 20: 397-420.
- [2] KEKALE T, VIITALA R. Do networks learn? [J] Journal of Workplace Learning, 2003, 15(6): 245-247.
- [3] 王宇露. 海外子公司网络学习的构成与学习方式研究[J]. 情报杂志, 2009(9): 140-145.
- [4] LARSON A. Network dyads in entrepreneurial settings: a study of the governance of exchange processe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7: 76-104.
- [5] UZZI B.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embeddedness f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organizations: the network effect[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1996, 61(4): 674-698.
- [6] GRANOVETTER M. Getting a Job[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212.
- [7] BURT R. Structural Holes: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Competition[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92.
- [8] UZZI B. 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 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42(1): 35-67.
- [9] ZAHEER L, Bell J. Benefiting from network position: firm capabilities, structural holes, and performance[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5, 26(2): 809-825.
- [10] JOHANSON J, MATTSSON L. Interorganizational relations in industrial systems: a network approach compared with the transaction-cost approach[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Management & Organization, 1987(1): 34-48.
- [11] VERONA G. A Resource-based view of product development[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9, 24(1): 132-142.
- [12] BROWN S, EISENHARDT K. Past research, present findings, and future direction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2): 120-139.
- [13] TSAI W. Knowledge transfer in intra-organizational networks: effects of network posi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on business unit innovation and performance[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5): 996-1004.
- [14] 蔡宁, 潘松挺, 岑胡磊. 非营利组织的组织学习与组织绩效的关联机制[J]. 技术经济, 2008(9): 10-15.
- [15] SINKULA M, WILLIAM B, THOMAS G. A framework for market-base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linking values, knowledge and behavior[J].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997, 25(3): 305-318.
- [16] TSANG E, NGUYEN D, ERRAMILI K. 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performance of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y of Vietnam[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arketing, 2004, 21(12): 82-103.

Analysis on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s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Network Structure and Performance of Network Learning: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123 Subsidiaries in China

Li Yuanxu¹, Huang Ping¹, Wang Yulu²

(1. School of Management,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hanghai Dian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5, China)

Abstract: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network competence. In transnational operation, the difference of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influence not only specific advantage of foreign subsidiaries, but also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ence of whole MN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ost country network structure of overseas subsidiarie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between the host country network structure and network learning performance. Sampling the 123 Chinese subsidiaries of the foreign companies, the empirical studies show that: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network density and network learning performance;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has a posi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the strength of relation embeddedness and network learning performance;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has a negative moderating effect between degree centrality and network learning performance.

Key words: overseas subsidiary; network structure; positional embeddedness; network learning competence; network learning performance